

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述

○ 谢廷秋 著

中国当代作家的 城市想象与表述

【新视觉书坊】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述

谢廷秋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述/谢廷秋 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1

(新视觉书坊/万家超主编)

ISBN 978-7-104-02869-7

I. 中… II. 谢… III. 文学评论—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067 号

新视觉书坊：中国当代作家的城市想象与表述

责任编辑：左灿丽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 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潍坊学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5

字 数：18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104-02869-7

定 价：220.00 元(全十册)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1

一 作为文学史范畴的城市文学 / 1

1. 问题的缘起 / 1

2. 两个空间. 两种意象 / 7

3. 城市化与现代化 / 13

4. 从乡土到城市: 21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转向 / 17

第二章 现代城市文学的当代转型 / 23

一 历史记忆的复活 / 23

1. “个体欲望的放肆”: 新感觉派文学的现代派叙事 / 25

2. “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 激进左翼的乌托邦叙事 / 30

二 两种承续. 两种变异 / 37

1. 欲望的变体: “小巷深处”的回声 / 37

2. 激进的对接: 从“子夜”到“早晨” / 42

三 社会革命的城市想象 / 48

1. 城邦的护卫者: 霓虹灯下的“哨兵” / 49

2. 对另一种异化的思考: 组织部的“年轻人” / 54

第三章 群体欲望的宏大叙事 / 61

一 革命: 占领城市和改造城市 / 62

1. “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 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 ”: 《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意识 / 63

2. 胜利者的欲望: 《上海的早晨》对城市根基的动摇 / 66

二 继续革命：“文革”“老三篇”的城市图景 / 75

1. 普遍化图景 / 76

2. 狂欢化图景 / 85

3. 仪式化图景 / 91

第四章 主体意识觉醒与城市文学新生 / 100

一 别无选择的选择 / 100

1. 在《单位》中沉浮挣扎 / 103

2. 突破体制的渴望在生长 / 107

二 现代都市要用现代情绪来感受 / 113

1. 《大上海沉没》：别一种现代性在沉没中新生 / 114

2. 《废都》：“在血污中闯出一条路来” / 119

三 我思故我痛 / 126

1. 《欲望的旗帜》能高高飘扬吗 / 128

2. 叹《家园何处》 / 133

第五章 焦虑的现代性 / 140

一 空前的心灵困境 / 141

1. 赤裸裸的性与钱：上海宝贝“爱美元” / 142

2. 病态人生的经验：《生活之恶》 / 148

3. 逃离与出走：在《别人的城市》《我不能回家》 / 153

二 想象力匮乏的众语喧哗 / 157

1. 不断重复的官场故事 / 158

2. 世俗化的大比拼 / 161

3. 虚假的怀旧 / 169

第六章 城市文学批判 / 178

一 欲望化批判 / 178

二 个人化批判 / 189

三 平面化批判 / 199

四 此岸与彼岸 / 206

第一章 绪 论

一、作为文学史范畴的城市文学

1. 问题的缘起

回溯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城市文学一直是个不太景气的门类。其实,从古到今来审视,相对于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也一直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这是由于中国的农耕文明特色所决定的。

“中国历来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文明在中国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农耕文明的影响渗透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个角落。即使到了现代的中国社会,农业文明、农耕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显著特色。由于这种文化的滋养与哺育,在中国发展得最发达的文学就是田园诗歌、山水散文、乡土小说。”^①中国的文学最初是从农耕文化中创生出来的。在古代文学中虽然也有写城市生活的,但是,其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对农村的描写,它们仍然摆脱不了农耕文化的浓烈色彩。因为封建自然经济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城镇,只能是农村社会的附属品,是不可能具备城市的独立品格的。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商业化,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学一样,都是不可能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的品格的。因此,中国古代描写城市的市井文学算不上纯粹的城市文学。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学一直是不景气、不发达的。“五四”时期,当知识分子题材和乡土题材的小说蓬勃发展且已成蔚然大观的时候,城市文学还是一个沉寂的、尚未觉醒的家族。

^① 刘中项:《论城市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的重大意义》,《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4,1.

除了“五四”新诗中有少量对于城市下层劳动者生活的歌吟之作（如胡适的《人力车夫》等一部分作品）外，“五四”小说对此极少有所涉及。这状态到了30年代才有了较大的转化，以老舍、沈从文描写北京人生活的小说为代表的“京味小说”、“京派文学”异军突起，让世人引颈翘首，刮目相看。与北方遥相呼应的是以茅盾、“新感觉派”描写上海人生活的小说为代表的“海派文学”。茅盾的《子夜》第一次以宏大的气魄和结构，将现代都市上海的色彩与声浪——上海都市文化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和盘托出给我们。新感觉派的作品更是把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态人情描绘得绚烂多姿，更难得的是，他们揭示了畸形的洋场文化中生活着的焦灼的都市灵魂。

40年代张爱玲则营造了另一种都市的“传奇”，她的作品浸淫了沪、港社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不露声色地对中国都市的封建性、殖民性进行冷静的批判。张爱玲展现了中国近现代都市生活的奇观。三四十年来，这是中国城市文学的一次繁荣。

进入当代，新中国成立之后，作家们以一种欣喜的心情，发现着、弘扬着新的市民灵魂、市民精神，他们看到在新中国红旗照耀下的城市焕发新生的光辉。以陆文夫《小巷深处》、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欧阳山《三家巷》、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文学作品迅速崛起，它们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新的城市文学的勃勃生命。

但是尽管如此，城市文学并没有真正形成“高潮”，各个时期的城市文学没有形成与乡土文学分庭抗礼的局面，难与乡土文学相比肩，更不用说超越它们。现代文学时期，就沈从文而言，他描写北京人生活的小说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就比不上他以湘西乡村为背景的小说，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奠基人物。他所塑造的以阿Q、祥林嫂为代表的一系列乡土人物形象在文学史上无可比拟，更不用提废名（《竹林的故事》）、师陀（《果园城记》）、许钦文、萧红（《生死场》）等人组成的洋洋乡土文学大军了。四五十年代，赵树理以农民为主要叙事对象，站在农民的立场为农民写作，取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新时期有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黑旗》）、张炜（《古船》）、陈忠实（《白

鹿原》)、莫言(《红高粱》)等人以他们对土地的特有理解和敏感而深厚的乡村生活经验,对乡土人生进行着审美性解读。他们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乡土世界。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会一直处于不发达的境地?这与我们中国的城市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考察城市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和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市场功能的不断完善有着最根本的关系。正是城市的不断发展才造就了城市文学的萌芽、兴盛直至异军突起。从自然生态学的视角去看中国城市的流变与发展,我们也许会更清楚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缓慢,以及中国城市文化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的个中原因。

古代的中国是农业型的,有着内陆封闭型的经济、地理、文化形态,这决定中国古代的城市无法超越这种农业、封闭、内陆的文化制约。安放在农村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封建政治经济体制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未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那样孕育出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文观念或城市意识。只要稍稍留心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城市,绝大多数都地处大陆内部。西起咸阳、西安,中到洛阳、开封,北有北京,建都时间长至千余年,短则数百年,历六朝、七朝等时间不一,弥久不衰,威威赫赫。然而这些城市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上,较少表现出其“经济杠杆”的作用。战时,它们作为城堡;平时,它们是政治权力中心。这和西方城市的兴起大异其趣。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它们常常建立在交通便利、商业贸易发达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因此,这些城市一旦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旧的封建结构对立的。城市的壮大繁荣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与此相异趣的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大多是郡县政府衙门的组成部分(政治权力中心),封建王朝一旦瓦解,这些城市的衰落也往往降临。每当中国封建王朝崩溃,动乱首先破坏城市,于是资本主义的萌芽常常在焚毁旧结构的烈火中化为灰烬。这样,中国城市的存在或发展便无法创造、提供一种异质于乡村文化的以商业文化为核心的城市

文化。^①

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社会，中国出现了一批因“通商”而产生的沿海城市群落，如广州、上海。这种殖民化的城市，少量的现代意识的文化因子伴随着耻辱与血泪，“十里洋场”式的殖民化的城市文化，命定地是腐朽的、衰败的、悲剧的。

建国之后，我们虽然对城市进行了必要的社会主义改造，极有希望在此基础上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但是如若依了严格的“现代城市”的尺度去看，现代中国的城市只能算是“准城市”，即城市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很低，差不多可以称之为“乡镇”。这直接导致了城市文化的不发达，城市意识的不发展。

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突出强调文学从知识精英走向大众化，强调通俗化和民族化。因而与农民相联系的文学创作，更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长足的发展。对比之下中国的城市文学创作就较为落后。这种状况使得现当代的许多作家写农村，写农民都活灵活现，得心应手；一旦写城市，写市民总会捉襟见肘，应付不来。文艺政策的鼓励造成作家们在审美倾向上的“厚此薄彼”，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城市文学的不发达性，最根本的原因还来自创作主体——作家自身。20世纪中国作家几乎都可以被称作为“地之子”、“乡下人”，与乡土的血脉相连使他们的灵魂深处有着对乡土的深刻认同。他们内在的精神结构是乡土的，因而尽管他们会漂洋过海、会身居城市，但无法改变他们对乡村的感情、对乡村的体认。尽管他们目睹城市的繁华、灯红酒绿，他们外在的衣着装束也可能城市化，但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趣味仍是“乡下”的。这种对城市的疏离隔膜的感情状态，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艺术视界、美学趣味。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固守“乡下人”精神家园的努力，这种复杂的、矛盾的、微妙的心境，许多时候使他们反倒与身边的都市生活的心理距离过远，而与过往的遥远的乡村生活更近。城市文学的被冷落、不发展也便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

新时期是城市文学的又一次繁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城市文

^① 陈继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33页。

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正在成为中国当下最重要的人文景观。“城市化”的突飞猛进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中国城市文学迅速崛起,90年代发展迅猛,新一代作家的创作几乎都是以现代都市为中心而展开的,作家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于城市,表现城市的文学状态兴盛起来。城市文学已经从数量上到内质上都达到一定的高度,到世纪末甚至超过乡土文学,一跃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花开两朵到了80年代呈现出更绚丽的景象:在“新京派文学”中,不仅有继承了老舍的市井风俗画风格的邓友梅(如《烟壶》)、刘心武(如《钟鼓楼》)、陈建功(如“谈天说地”系列小说)、汪曾祺(如《云致秋行状》)等人,还有在老舍的传统之外描写“新北京人”生活的王朔(如《顽主》、《玩的就是心跳》)、邱华栋(如《新美人》)、刘心武《风过耳》、张抗抗《作女》、丁天《漂着》等也属于这一路,由此可见,“新京派文学”较之原来的“京派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海派文学”亦然,40年代以张爱玲、苏青为代表的世俗化风格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与作品诸如王安忆(如《流逝》)、程乃珊(如《祝你生日快乐》)、王晓玉(如她的“上海女性”系列小说)、唐颖(如《随波逐流》)等把那种世俗化的风格张扬到了极致。无论是对上海市民生活的描述还是对市民心态的剖析,甚至在反思历史的深度、表现世事的沧桑方面都开出一条新路,将世俗体验充分地融入作家对历史、人生的感慨之中。与“新京派文学”、“新海派文学”相辉映的,是“苏州文学”、“武汉文学”、“天津文学”、“特区文学”的争妍斗奇。“苏州文学”的代表作家陆文夫(如《美食家》)、范小青(如《裤裆巷风流记》)、朱文颖(如《水姻缘》)、燕华君(如《听听耳环》)分别写出了老、中、青三代作家眼中的苏州市民的世俗生活。“特区文学”主要以一些女作家为代表:文夕《野兰花》、《罌粟花》、《海棠花》、缪永《驶出欲望街》、《爱情组合》、央歌儿《我在B镇的岁月》都在描绘特区的紧张生活、激烈竞争、紊乱情感方面写出了各自的特色。以冯骥才(如“怪世奇谈”系列小说)、林希(如《高买》、《蝓蝓四爷》)为代表的“天津文学”则以凸现老天津的奇风异俗为特色,或意存讽世,或旨在逗趣,都能写得

妙趣横生。天津的方言土语,天津的夸张气势使它们拥有浓郁地域色彩。以方方(如《落日》、《黑洞》)、池莉(如《不谈爱情》、《来来往往》)的异军突起为标志,“武汉文学”也登上文坛。这两位女作家把武汉底层市民生活的粗糙、可怜写得动人心魄,同时还展现了武汉人泼辣、乐天的生命力。叶兆言的系列小说《夜泊秦淮》是记录南京旧事的“南京文学”;阎连科的系列小说《东京九流人物志》可称作是演义开封人生的“开封文学”;贾平凹描写当代西安文化人迷惘生存状态的《废都》可谓是“西安文学”。这些作品以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强烈的风俗画风格,谱写了中国城市文学史上空前壮观的绚丽景象。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文学已经走向繁荣,这与中国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城市大发展是城市文学迅速崛起的客观依托。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20世纪末期,我国进入了一个城市增容迅速的大发展时期。整个社会的重心转移向城市,城市生活不仅日益被人们了解、熟习,而且城市生活也在迅速现代化。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文化已经开始深入地影响与改造社会文化的性质。城市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地被人们接受。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人们生活的城市化当然客观地要求文学积极地反映人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市民生活的各种内容,迅速成为文学描写的题材,文学转而更多地表现城市,表现城市的现代化,从而促进了城市文学的蓬勃发展。

文艺政策的宽松也是城市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以后,党的文艺政策变得较为宽松,鼓励创作题材的多样化,文学创作指向多元化。追新求异,力破传统成为作家的重要认识与指导思想。作家们可以自由地把视角投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去创作。而这时繁花似锦的城市生活、万花筒的七彩流光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文学作品也进入市场,也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开始流通发展。因而,市场经济的商业法则就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城市的崛起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城市,城市本身的绚丽多彩:林立的高楼、摩登的小姐、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琳琅满目的商品……读者更渴望了解城市,更关注城市。表现

城市生活的作品就容易受到市场的青睐,从而获得商业运作的成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只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才称得上是现代社会。城市文学反映商业社会中人们的心灵律动,和商业社会中人们思想情感的种种变化,情绪波澜、心理特点、行为方式。而这一切又无不与发展着的时代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的发展不仅会造成文学上的“先锋性”,而且必然更进一步促进城市商业文化的发展,扩大商业文化的影响。同时通过城市文学也对市民生活造成影响。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与城市文学紧紧结合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除了客观的社会原因外,与创作主体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流变来看,文学创作的变化,首先是作家创作观念,创作思想的改变,然后才会有创作题材、创作方法技巧等的改变。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城市文化的包容开放,都使作家们感到能够自由挥洒,游刃有余。城市中的大千世界使他们感到更容易发现新的生活现象,更便于新技巧的运用和表达,更容易寻找到追新逐奇的读者。这一切都使作家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于是随之而来的是各式各样城市新题材、新技巧、新表现的文学作品大行于世,并受到读者的追捧,使城市文学迅速崛起并走向繁荣。

2. 两个空间、两种意象

城市和乡村向来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在社会生活领域,它们揭示了人们的两种生存空间。自城市逐渐形成以来,城市和乡村就是作为两种对立的话语体系而存在的。城市意味着商品、交换,乡村蕴含着自然、自给自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达到一定高度,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更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乡村与城市的截然两分,不仅在社会政治领域演绎成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发展的同义语,也在文化思考与文学创作中成为一种显在或隐性的价值坐标或思维框架。历代作家对乡村与城市的想象和描述构成文学创作中的两大意象。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度,农村与乡土已经深深地渗透入中华儿女的血液,因而作家们的艺术实践中,对于乡村文化的流变,对于农民灵魂再造的关注,成为其艺术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学始终都以极大的兴趣和较多的作品,探索着这一古老而又沉默的农业之魂,从中透视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仅以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为例,作家们对乡村的描述呈现出以下几种形态:

(1) 受批判的乡村。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关注与探索,具体而言为对农民灵魂的改造。无论是战乱的现代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时期,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对“国民性”进行探讨,都对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予以揭示,关注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其中,有一部分发露着乡村文化的落后、野蛮、封闭、沉闷,和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从而对乡村农民这一古老的群体生存方式——他们的生态和心态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这方面,鲁迅可谓是“先锋”,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对其进行深刻思考并付诸于艺术实践。在小说中,鲁迅表现了中国旧式农民文化心态中的驯良、依附、愚昧、麻木、自私、保守、卑怯、苟安的特性。诚然,作为劳动群众,农民身上确存在许多自然形态的淳朴、勤劳等美德,这在鲁迅的小说中也得到了生动的表现。但是他所着力发露的是农民精神的劣根性,是对于“沉默的国民灵魂”的剖析。阿 Q 无疑是旧式的农民的代表。阿 Q 的落后、保守、盲目乐观、陶然自得,以失败为胜利的思想观念,仍是基于小生产的观念眼光、思想方法。作为一名被压迫者,除了留下很少一点被扭曲的反抗情绪,他竟变得如此驯良卑怯,攀龙附凤,倚高接贵。鲁迅对于阿 Q 以及旧式农民古老灵魂的剖析与批判,时时昭告我们:从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站得高点,看得远些,由狭小的天地走向一个广阔的世界。鲁迅以不凡的手笔写出了广大的乡村社会所存在的一个巨大的“看客”群。这些“看客”,灵魂空虚麻木,思想愚昧混沌。他们的无目的感,无是非观,对周围“从来如此”的阴冷环境麻木地忍受,对新起的社会事变漠然视之。《祝福》中的祥林嫂便是这种“看客”目光下的娱乐材料。《明天》中的单四嫂子也是如此。鲁迅在小说中揭示出农民这种冷漠、麻木,不仅直接酿成了自身的悲剧,而且实际上成为中国封建

主义强有力的支柱，反过来又加深了他们的悲剧。这种揭示无疑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稍后于鲁迅，20年代一批被誉为“乡土文学”作家的创作，承鲁迅之风，通过风情特异的选材，继续对“改造国民性”进行关注。许杰在《菜牙与小牛》中也揭示了农民精神上的麻木、愚昧。菜牙的父亲因为女人不生男孩，整日在醉酒和打骂老婆中生活。村里酒店的人们常常以此为乐，每每抓住菜牙问这问那。问她父母打架谁胜谁负，问她爸爸妈妈是否同床睡觉……这些精神愚昧的农民以对一个小女孩的折磨来满足自己精神的空虚。鲁彦在《阿长贼骨头》中塑造的阿长，许钦文在《鼻涕阿二》中塑造的阿二就是类似于阿Q的典型。为了报复一个曾发现他偷窃行为的村妇，阿长不惜撞洒那位村妇的油瓶，又趁妇女向他说理之机，用手往妇女的奶子上狠狠地一摸。“阿长心里舒畅得非常……终于他给报复了。这报复是那样的光荣，可以说，所有史家桥人都给他报复完了。”王鲁彦对于农民精神的愚昧、麻木、自私，揭示得可谓入木三分。许杰的《惨雾》里描写的“械斗”，王鲁彦《菊英的出嫁》中描写的“鬼婚”更是惊心动魄，这种传统“世风”更是原始野蛮、古老愚昧。这些小说都程度不同地揭示、批判了农民忍辱负重、安贫乐道的精神痼疾。

抗战的全面爆发，民族文化的回归，使得乡土小说对于农民心灵现实的艺术透视，继续沿着上一时期的方向发展着。端木蕻良的《大江》在对于我们民族“新鲜”、“强悍”、“韧性”的性格和“野力”的呼唤、搜寻中，对于青年农民铁岭的文化心理作了认真的解剖。铁岭是在一种麻木和无意识状态下生活的。他对于土地有着一种固执的粘贴性。这种缺乏个人思想、封闭自我的生活态度，使他只有“群性”而无个性，离开群体，便感到孤单、恐惧。师陀写他家乡的“果园城”，向人们展示这“城”中农民那苦难、愚昧、麻木的心灵。这里的人们麻木地生，麻木地死。《城主》、《刘爷列传》、《三个小人物》、《无望村馆主》中的主人公全是这样的苟活者。

40年代萧红写她的家乡呼兰河城。她赤裸裸地揭示了故乡小城中不健全的精神，沉默的国民灵魂。1938年夏，在大后方的一次抗战文

艺座谈会上，萧红曾说：“现在或是过去，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①《呼兰河传》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以“愚昧”一言以蔽之的乡镇的人情、世态，麻木的灵魂。呼兰河城的生活是刻板单调的，单调到几乎没有变化的程度。他们的人生哲学就是“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有二伯：“虽然也长了耳朵，但一辈子也没有听见什么。”精神的麻木竟到了对一切全无所谓的态度。萧红深受鲁迅的影响，《呼兰河传》的创作是她对于鲁迅改造农民灵魂艺术实践的明显继承。萧红用她那枝笔，写尽了中国农民灵魂的愚黯、精神的昏昧。

解放区的作家以赵树理为代表，全面反映了农民由奴到为主的心理蜕变。在反映变化的同时，部分作品注重对农民灵魂中愚昧、落后、自私、卑怯一面的剖析。《小二黑结婚》（赵树理）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中的霞村人等就是因着小农狭隘心理、农民传统的精神劣根性、缺乏爱、冷漠而在新政权形式下演出一幕幕悲喜剧。

建国后，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从剖析老一辈农民的灵魂入手，对农民精神的劣根性做出了新的理解和发现。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在对处于极低文化层次中的乡村妇女愚昧、顽劣灵魂的剖析中，照见了封建意识与小农习性的强固。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对进入城市参加工业建设的意义缺乏理解，态度游移不决。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对于青年农民文化心态的变化往往持一种简单化的态度，致使艺术评论失去历史感。

新时期的乡土作家在国民性批判中也非常重视揭示农民人格中残存的那种愚昧等落后的东西。朱晓平的《桑树坪记事》是一个代表。其主人公李金斗虽然非常精明，但是他仍脱不了骨子里的农民意识。他像其他农民一样对上边来的干部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村里人怕官，凡是脱产干部，到庄稼人嘴里就成了‘那是顶上家封下的官！’村里人把公社以上的各级领导，都称‘顶上家’，意思不外乎是在他们头顶上的人”。李金斗虽然是大队长，但他对上边派来的官也是充满了敬畏。村里开会，他的口头禅就是“顶上家说咧，让咱百姓如何如何……”。李

^① 转引自《〈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金斗多年来对彩芳的折磨，就是要迫使彩芳与仓娃结婚，成为他传递香火的工具，这是中国农民对绝后的恐惧。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及其他一些“寻根小说”，在更深的层面上，开掘批判了农民的精神之“根”。这个“根”又主要是“劣根”：自私、狭隘、萎缩的心理。乔典运的《满票》、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小说则带着强烈的“现代性焦虑”，探讨了农民身上的国民性痼疾对农村经济改革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2) 抗争的乡村。鲁迅及其稍后的一批作家，从“人性解放”的角度，首先看到的是作为个人的农民灵魂的愚昧、麻木的劣根性，“批判”的意向在他们创作中表现较为突出。而30年代的以蒋光慈、叶紫、洪灵菲、丁玲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则从“阶级解放”的视角，主要看到了作为“阶级”的农民精神的震醒、自觉，“肯定”的意向在他们创作中表现最为显明。每当社会剧变之时，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变动也是最为剧烈的时候。战争，作为政治的一种变体，总是给予民族的文化心理以巨大的冲击。30年代的乡土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写出了在悲壮的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农民精神的新生，对他们的“反抗”精神予以歌颂，这种形态的乡土文学是抗争的。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以雄健的笔法给我们描绘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这原野中生活着的朴实厚道，紧张的人民。但是这类以“歌颂”为主的小说，在注意写阶级、写群像、写斗争过程、写人物外在言行时，忽略了写农民深层的精神世界的变化，不免流于简单的结论，而少丰富生动的意象。

新时期农民的觉醒有了新的内容：不再是斗争，不再是战斗，他们冲破小农意识的樊篱，走向自由广阔的精神天地。有的作家从婚姻爱情方面开掘一代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表现新时期农民心灵的重建。楚良在《玛丽娜一世》中借玛丽娜之口说出现代女子的心声：她在月亮湾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案”，虽有几分戏谑，却表明了一批现代农村妇女自我灵魂的深刻觉醒和升华。有的作家注重描写农民在改革开放后如何冲破小农意识的束缚，从而走向发家致富的发展道路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找到了自我的位置，重新确立了自我价值观念。成一的《洼地》中的马占奎悄悄地把自己承包的100亩树林，留给村人，留给后人。

这是农民的一种精神追求，表现现代农民的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张炜在《古船》、《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等作品中表现新时代乡村青年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他们的心理也在渐次蜕变。《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在积极从事商品生产中，渐次确立着现代民主意识。新时期之后的乡土文学，对经济改革大潮中的农民，敢于打破以往的陈规，勇敢地追求新生活，确立新的观念，给予充分的表现与肯定。这个时期的作品内容丰富，较之战争时期有更大的艺术性。

(3) 田园式的乡村。不同于当时的大多数作家，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剖析农民的心灵世界。沈从文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宁静、平和的田园式的乡村。这种“宁静平和”的乡村世界是现代文明的另一种补充，它使我们看到世风日下与人心腐烂的城市之外，还有着心灵的家园。沈从文以一种深深忧虑的心情，用富于传奇性的选材，极写乡村社会人们心灵的率真、执著、坦诚、放达，赞美他们人格的朴素宽厚，洒脱雄强。沈从文在《边城》等小说中，就描述了这个宁静平和的乡村，并且是把它作为现代都市那种虚伪、矫情、自私、势利的世情心态的反衬和对立物来写的。沈从文的田园式的乡村也许有点虚幻，不那么真实，但是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烛照下的彼岸世界，给人们建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它具有未来意义。新时期也有一些作家继承沈从文的乡土精神，在宁静、淡泊的乡村世界中守望精神家园。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汪曾祺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大多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即使遇到大的灾难也采取认命的人生信条而淡然应对。《钓鱼的医生》中的王淡人是个医术和人品都很好的人，但只能在乡间过十分清贫的日子，但他并不计较。小说中描写了他的闲情逸致倒让人印象深刻：他喜欢郑板桥的一副对子，“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就一定要在院子里种出瓢菜和扁豆来。知识分子的这种旷达超然的处世态度，不争不抢、自然无为，宁愿在闲情雅趣中寻求精神寄托，表达了作家的一种乡土理想。而下层民众则甘守清贫，出一分力气得一份报酬，身居贫困中也自得其乐。汪曾祺小说中醇厚古朴的民风创造了特殊的美感，也对人类的物欲横流世界的精神出路给予探索，向读者描述了一种彼岸世界的可能，从这个意义而言，田园式的乡村意象的塑造确实是对人类精神终极